

参 考 信 息

江苏理工学院图书馆主办 第 5 期 (总 174 期) 2015 年 4 月 25 日

完善大学治理结构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编者按：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那么，如何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呢？首先，围绕大学新型关系要重点解决三大问题，即政府如何依法管校，学校如何自主办学，社会如何参与监督。同时实行“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而治理结构是现代大学组织的物理环境，主要从大学与外界以及大学自身内在权力结构去考量，运行机制则是现代大学组织的运转操作平台，主要从大学管理效率与公平去考量，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不仅需要重新建构权力关系，也需要重新定位院系职能，还需要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和公正的成长环境，只有在清晰的权力架构、明确的院系职能、自由的学术氛围和祥和的校园环境中，大学才能真正实现教书育人、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功能。为此，我们选编部分材料，供领导和相关部门参考。

目 录

1. 院校转型与制度变迁的层次拓展——基于牛津大学校史的研究..... (2)
2. 对教育部首批核准的六所大学章程分析与建议..... (6)
3. 中国大学学术生态的历史反思与现代重建..... (9)

院校转型与制度变迁的层次拓展

——基于牛津大学校史的研究

牛津大学近九百年经历了三次大转型。每一次转型的实现与超越都是其办学理念与组织制度的一次变迁，是把不同的制度要素组织起来实现制度建立和制度创新的过程。

（一）牛津大学的发展史

牛津大学校史可分为四个时段。

1. 中世纪时期：萌芽与雏形

关于牛津大学建立的传说很多。一说在1167年，英格兰国王同法兰西国王发生争吵，英王一气之下，把寄读于巴黎大学的英国学者召回牛津；此后，这些学者聚集于牛津城从事经院哲学的教学与研究。随着人们开始把牛津作为一个“总学”时，牛津大学便初具雏形。到12世纪末，只有牛津大学享有大学的资格，被称为“师生大学”，成为英国教育的领头羊。1201年，它有了第一位校长。1213年，学校从罗马教皇的使节那里得到第一张特许状。后为平息牛津城的居民和学生之间的骚乱，学校建立寄宿校区，创立“大学学院”制。

2.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活跃与兴起

牛津大学的影响力在文艺复兴时期迅速扩大，一批“大学才子”对文艺复兴大师莎士比亚早期的作品产生影响。1530年，出于国家对西班牙斗争的政治和经济需要，以及国王亨利八世强迫牛津大学接受他与皇后凯瑟琳的离婚，亨利切断了政府同罗马教廷的关系，此后宗教势力对大学的影响被严重削弱。到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即位，随后四五十年稳定的政局使大学迅速发展，地位一再提高，逐渐世俗化。大学毕业生不再专门做神职人员，许多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同时大学也贵族化，学生主要以贵族子弟为主。1636年，时任校长的威廉·劳德把过去各学院杂乱纷繁的规章制度编纂成一整部详细的校规，即《劳德公约》。经他整顿之后，学校声名大噪，得到许多捐款，新建许多建筑物，成为一所近代化的传统大学。

3. 内战和工业革命时期：曲折与蜕变

1642~1651年，英国陷入内战，许多战役在牛津附近开打，校园成为国王查尔斯一世逃难的居所。他不仅携女眷居住在学校内，还在学校召集反议会联盟进行斗争，使学校道德水准大为降低。1649~1653年共和时期，新军首领奥利弗·克伦威尔自封校长，试图用清教徒思想改造牛津大学，但收效甚微。1660年，王政复辟，学校恢复正常教学。但作为妥协产物的复辟，两党轮流执政带给大学的是校内被分成两派，施行宗教上的关门主义，教学质量严重下滑。1780年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学校慢慢从内战的创伤中复苏。对于以人文教育为主的牛津大学来说，工业革命更多的是丰富了毕业生的社会科学著作素材，一些经济理论和政治思想为后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是科学技术对大学有所触动的时期。学校充分发挥培养精英人才的优势，培养了不少政治家参与并领导了英国国内的工业、商业、财政、金融变革。18世纪末，议会对古老的牛津大学施加压力，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到19世纪末，学校将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增加到人文课程为核心的专业设置中，其中包括医学。学校在艰难蜕变中走向现代化。

4. 21世纪以来：辉煌与挑战

今天，牛津大学除了在文史哲、法律、经济等人文社会学科一直保持明显的优势之外，在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方面也保持着学科前沿的位置。在近900年的历史中，大学培养了5个国王、26位英国首相、多位外国政府首脑、近4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一大批著名科学家——牛津大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大学高居世界大学之冠的日子已不再。21世纪以来，为应对全球范围的激烈竞争，学校在约翰·胡

德校长的带领下，正历经改革阵痛以适应新环境的挑战。

牛津大学的制度变迁据此被视为三次质的转型：第一次转型出现在16世纪末，它实现牛津大学从宗教神学走向世俗化的超越，成为英语世界顶尖的近代大学；第二次完成于19世纪，大学从传统老校步入现代化，成功跃居一流精英大学之列；第三次是在新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变迁，试图从区域性大学向国际化大学迈进。

（二）牛津大学三次转型制度维度的变化

1. 第一次转型：从宗教到世俗化

从中世纪萌芽到文艺复兴前后历时约五个世纪，牛津大学从宗教向世俗发展，成为一所近代化大学。首先，人才培养目标上，学校变得更加注重以优质人文学科为培养载体，以培养政治领袖人才为主。其次，管理方式上。大学的学者们巧妙地借助外部力量，在管理权上获得诸多特权，使教权和世俗政权——教皇和国王——对大学持保护和认可的态度；内部管理则几乎是完全独立的、自我的管理。学术人员在大学里，只要不违背当局要求的一些规则就可以自由地追求学问，著书立说。同时伴随教学从大学向学院的转移，学院制和导师制逐渐成熟，教学内容发生变化。成立之初，牛津大学的教学重点是经院哲学、古典学；课程内容主要是神学和拉丁语、希腊语等；后来属于“四艺”的自然科学内容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逐渐保留在大学课程中。科研方面，12世纪英国科学的传统在牛津大学得到充分发展。在资源经费方面的世俗化倾向更为明显。15世纪以前，大学主要依靠教皇的资助，后转向固有的传统资助项目，包括来自国王和王子、地方的主教、贵族成员和上层绅士以及教会的资助等；到16世纪末期，捐赠是学校重要的收入渠道。

2. 第二次转型：从传统到现代化

牛津大学历经内战时期的衰退与蛰伏，到工业革命之后一跃实现现代化，迅速占领欧洲学术制高点，跻身世界一流精英大学之列。19世纪牛津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经历了从培养各行各业综合性人才，到具有科学创新精神人才的转变。就外部管理看，宗教改革以后，大学管理陈腐，忽视科学研究，在学人数减少，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教学科研上，18世纪的牛津大学仍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保守、反对改革的立场。直到1882~1886年间，时任副校长的本杰明·乔伊特教授在学科改革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使学校教学内容大为丰富，研究趋于专门化。在政府、基金会和企业的资助下，大学一级的各大实验室发展迅速，规模很大，成为科学教学和研究的主要手段。资源经费也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学校与社会的疏离和距离，教会权威削弱的情况下，学校很难从外界获得很多的收入。1989年学校开始接受国家的资助，依靠贵族的学费和政府的拨款成为大学经费主要来源。

3. 第三次转型：从区域到全球化

进入21世纪，牛津大学面对来自校园内外、国家内外的挑战，开始第三次转型。学校不仅继续培养大批政治领袖人物和杰出的政治精英，还致力于培养文学、物理、经济、医学、数学、化学等各行各业的学术领袖。在管理方式上，面对新世纪发展困境，学校正视其管理体制的先天缺陷——一套复杂的学院制度体系：中央机构对于学校事务管理极不称职，各个委员会职权重叠，运行效率大打折扣。教学科研上也面临挑战。新世纪到来，大学从偏重人文学科和基础理论研究、轻视应用科学和技术研究，逐步开始调整学科结构，力图使文理学科达到相对平衡。资源经费上变化很大。两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和社会更加关注高等教育，通过扩大经费支持以及咨询和科研等项目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1919年至1945年间，政府拨款份额基本保持在大学总收入的1/3左右，其余大学自筹；二战到战后初期，政府财政拨款高达学校总收入的60%以上。同时，学校加强与工商业界的联系，通过课程改革培养新型人才密切与企业的合作，从工商业界获得更多经费支持。

（三）理论解释：转型的制度变迁层次的拓展

牛津大学三次制度变迁，是学校转型的过程，也是制度变迁层次的拓展。

1. 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

在第一次转型中，对牛津大学实施影响的主要是牛津城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大学内部的变化。牛津城的城市化是主要的政治经济环境：从偏远的牛津渡口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的中心，大学也逐步成为英国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而牛津城居民与大学之间的冲突则使学校有了独立的校舍和校区，有了政府和国王赋予的特权。随之，大学内部组织出现变化。随着皇权与神权逐渐决裂，出于世俗政权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学校肯定了国教在大学中的地位，逐步向皇权倾斜，与政府当局靠拢。此举不仅获得合法性，也得到资源支撑。可见，牛津大学在教权、王权即新生的城市权力的夹缝中逐渐形成并发展，它是多种势力拉拢争取的对象。这注定学校的发展逐渐从神坛走向近代化，成为古典大学的典范，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和知识创造基础。

第二次转型中在16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宗教、政治、经济和思想等方面的变革和发展刺激了社会对大学教育的需求，更多人进入大学，很多人学习法学、医学、哲学等专业知识，大学与社会需求的联系变得密切起来。牛津大学却仍然坚持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的教育，凸显学校与时代的脱节。另一方面，从诞生之日就与牛津大学密切相关的剑桥大学的变革也深深影响了牛津大学。剑桥是牛津大学学生和市民冲突之后，师生流落到剑桥建立的，但两者的发展路径却不同。牛津的人文科学更强一些，剑桥的工程技术更有优势。对于剑桥大学，大学的科学知识可以直接促成工业革命或者工业革命直接刺激大学内部的科学研究。牛津大学只有适时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才能继续与剑桥大学保持在同一个发展水平上。19世纪中期，学校部分教授发动了宗教复兴运动（史称“牛津运动”），自由主义者和传道派在大学新生宗教检测制度留存等方面展开交锋，最终以保守派的失败告终，促成了自由主义的传播，使大学成员认识到传统大学的狭隘性，为学校改革扫除了思想障碍。

第二次转型后，全球化迫使牛津大学不得不面对一个更高层次的制度环境——世界系统。此时大学面对全球制度变迁、欧洲一体化和大学国际化的复杂形势。全球化使得欧洲高等教育面临学术中心被20世纪的美国逐渐取代的现实；而两次世界大战和多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重创后的五十年，欧洲高等教育正在建设新的、国际化高等教育体系；21世纪初推进欧洲一体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进程，将欧洲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增强其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2. 大学文化传统的变迁

第一次转型中，牛津大学面对经院哲学衰微和人文主义兴起等文化传统的变化。学校内部组织在16世纪利用宗教改革彻底削弱神学的垄断，“冲破经院主义神学和哲学独霸大学讲堂的局面”。随后，学校内人文主义学者逐渐增多，人文主义在文科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得到基本确立。伴随的还有学院文化逐步形成。牛津大学从诞生之初典型的组织松散的学者行会机构，逐渐变成学院是大学最重要的组织。而后，正是这种学院文化促成学校变迁的制度层次扩展到组织种群。因为学院的出现加深了学校作为一所地区性大学的特征——每一所学院的创建者都给予组织场域内某些特定相关者入学等优先权，如亲属、家人和朋友、创建者所在地的居民等；另外由于学院都有固定的建筑和校舍，限制了学校的迁移——大学与政府当局抗衡的重要武器，因此也削弱了其国际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各自为政的学院文化使权力集中于学者团体内，集中于组织自系统的完善，成为以后学校转型重要的“组织基因”。

第二次转型，文化的变迁进一步推动大学变革的层次拓展。民主传统和自由主义的积淀逻辑使大学走出组织自系统，面对整个英国浓重的民族文化特性。这种逻辑使得整个英国社会的思想和制度，无论政治、法律还是经济和教育，都倾向于尊重人民的意志，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社会 and 人民生活，公共领域由人民自己管理。处于教育领域的牛津大学也同样奉行自由的理念和政策，响应社会需求，即人们对良好教育的渴望，着力造就资本主义社会新人

的绅士教育，并由此成为世界精英教育的楷模。

第三次转型中大学被迫面对跨国的世界系统，源于大学职能的无限拓展、学院文化的变化和管理主义的兴起等文化传统的变迁。两次世界大战弱化了大学的教育职能，但突显了大学的科研和社会服务职能在国家生存危机和改革发展之中的重要作用，这是高等教育职能的重大拓展。牛津大学不能再局限于过去国内精英人才和各行各业领袖的培养，而是要积极服务于全人类。第三次转型中，遭到反对最强烈的即是对学院制的改革。而管理主义色彩在此次转型中很明显。首先是聘请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校长约翰·胡德出任校长，这是以保守、精英化著称的牛津大学史上首次聘任英国以外、并有商业背景的人士出任校长。然后是管理人员职业化。牛津大学是学者治校传统的高校，大学的主要管理职位多由学者担任或兼任。转型中提出改组现有董事会，大量引进校外人员，特别是财务等方面职业管理人员来对大学实行“专业化”管理，以提高大学行政管理效率。再次是管理机构专业化问题。此次转型属意将学术管理与大学整体行政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分离。因此第三次转型能否最终顺利实现并超越，关键在于将管理主义理念融入大学发展尤其是历次转型中沉淀下来的文化和制度中。

3. 重要行动者的出现

第一次转型主要由组织内部的校长和学生构成重要行动者。1215~1221年任校长的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被看作牛津大学科学运动的关键人物，他翻译了大量新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1247年，罗吉尔·培根从巴黎到牛津，他注重实验科学，对数学、天文、语言学均有研究，被公认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人物……他们是学校世俗化重要推手。而在缺乏政府资助和赠与时，贵族学生通过他们的父母等亲属为学校提供资助。从14世纪末开始，学校逐渐依赖世俗贵族的富有成员对其在财政和政治上的支持。贵族阶层在大学中的体现越来越明显，又反过来助长了学校的精英传统。

第二次转型的关键行动者则从大学组织内部拓展到外部，尤其是社会中间阶层的影响。光荣革命后，大商人、银行家、大农场主、政府官员、教士、知识分子逐渐形成社会的中产阶级，开始在经济、政治和教育活动中发挥作用。他们不但逐渐争取到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机会，还要求高等教育机会，并企图按照自己的理解发展高等教育。他们兴建私立的和非国教的学园把现代科学作为中产阶级教育的重要内容，培养了中产阶级需要的人才。当然外部行动者的影响也需辅之以校内学者的响应。在先锋学者的号召下，学校形成科学教育思潮。

第三次转型的重要行动者本身发生重要变化，校长出身的变化是根本的。21世纪牛津大学转型最初的倡导者是学校几任校长。他们审时度势，提出了制定学校学术战略规划，拉开学校治理结构改革的序幕。他们考虑的不仅是学校内部的需要，更多的还有世界系统层次的衡量。校长们实际上就是作为制度企业家的行动者。如胡德校长的商业背景当然会促使牛津大学倾向于管理主义集权方向的转型。所以不管牛津大学的校长们个人特质如何，他们都严重依赖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组织或制度的位置。全球化正是决定位置的重要背景，牛津大学校长的遴选方式和个人背景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才能有助于学校向国际化方向的转型；而这对学校 and 校长本身都是更大的考验。另一派重要的行动者就是学术派，他们以对立的方式出现在先锋改革家——校长们的面前。他们以捍卫学校传统为由提出了种种反对改革的措施，并采取了实际行动，使改革的每一步都必须不断权衡博弈，全方位考虑。在两者之间的还有政府和企业代表，他们用行为干预和影响学校的改革。另外学校面临的小环境主要来自学生和普通教师等相关利益者。由于国家资助的奖学金数额逐年增加，所以学生和教师的构成逐渐实现非贵族化和男女平等。再加上留学生教育的拓展，学生多元背景涉及的相关群体变得更为复杂，和经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些行动者处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又处在复杂的世界系统层次上，学校必须考虑更多，使这一次转型变得异常复杂而持久。

（摘自：《院校转型与制度变迁的层次拓展——基于牛津大学校史的研究》教育学术月刊2013年第4期）

对教育部首批核准的六所大学章程分析与建议

自2012年1月1日《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施行以来，教育部于2013年11月首批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在内的六所大学章程，迈出了我国大学章程建设走向法制化与规范化的第一步。

（一）六校章程文本的可取之处分析

1. 章程涵盖了高校治理结构的基本方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指出：“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从法律角度来说，大学章程是依法治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上承国家教育政策和法律法规，下启大学内部管理，是大学发展、建设与管理的基本法”。大学章程重要的一项内容便是要对大学内外部治理体系和结构做出明确规定，使高校运行建立在有章可依、有章必依的法制基础上见表1。

表1 六校大学章程要素构成情况

章程要素	东华大学	东南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序言或总则	1	1	1	1	1	1
学校功能与教育形式	2	—	—	—	—	—
内部管理体制	3	5,6	3	4.27—4.29	—	3.32—3.42
组织机构	4	7,8,9,10	4	4.30—4.41,5	2	3.43—3.63
举办者	—	2	2	—	—	—
教职工	5	3	6	3	4	4
学生	6	4	5.48—5.53	2	5	5
校友	8.73	10.62	5.54—5.56	7.65—7.66	6	7.109—7.112
外部关系(学校与社会)	8	—	8.74—8.76	7	8	7
对外交流	—	—	8.77	—	3.41—3.43	—
经费、资产、财务制度	7	11	7	6	7	6
校旗、校徽、校歌、校标、校庆日	7	12	—	8	9	8
附则	9	13	9	9	10	9

注：数字代表章程中的章和条标号，如1代表第1章，4.27代表第4章第27条，“—”表示缺少要素。

2. 章程回应了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呼声和具体要求

从表2大学章程内容结构看，大学制度内涵的基本方面在章程中都做了详细规定。同时，对于现代大学制度要求彰显的学术自由精神，重视院系学术组织权力、重视社会参与等方面也有很好的体现。在社会参与共治上，多数大学章程也做出了学习榜样，如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在“外部关系”一章中提出，要接受社会中介机构对学校办学的评估与监督，探索学校与行业、企业的合作与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积极开展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合作，探索设立校董会、校友会等，这都体现了大学面向社会开放，寻求社会广泛参与的现代大学制度要求。在政府对学校的宏观管理和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落实上，华中师范大学在“举办者与学校”一章中明确了举办者即政府对大学拥有的八项权利和义务，明晰了政府对学校的管理界限，并指出学校依法依规自主享有的在内部组织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评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确定内部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权力。同样，东南大学在“举办者与学校”部分也明确指出学校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享有的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科研、产学研交流合作等方面的自主权利。

3. 章程彰显了学校办学与管理的特色

从六所大学章程文本来看,较好彰显了各校的办学与育人特色。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是一所培养外语专业人才见长的语言类大学。学校提出要以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人文情怀、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外语特长,并能够畅达进行跨文化沟通和交流的高端国际型人才”为育人目标,并在章程总则中提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促进多元文明沟通,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使命,从而较好传达了作为语言类学校创建高水平外语大学的特色诉求。中国人民大学章程提出以“主干的文科、精干的理科”为学科特色,“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现了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研究型重点大学的办学特色和崇高境界。

其次,章程也较好彰显了各校的管理特色。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法》和《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已经明确我国公办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采用校院两级组织形式。像东华大学就设立了校董会,并明确了其主要权利和义务是为学校发展规划、重大决策提出建议和意见,为学校引进优质资源,促进学校对外交流合作,监督办学资金的使用。东南大学在“其他机构”一章中,提出除设立董事会、校友总会外,还可依法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重大事项的咨询和建议机构,设立教育基金会以加强学校与外界的联系与合作,设立公共服务机构履行各项服务职能及其他联合研究中心开展合作办学、科研等活动。

表2 六校大学章程内容结构比较

学校	章节字数	内容结构
东华大学 (工学类)	9章,77条, 14页,8542字	序言;总则;功能与教育形式;管理体制;组织机构;教职工;学生;经费、资产、后勤;外部关系;附则
东南大学 (工学类)	13章,86条 17页,10405字	序言;总则;举办者与学校;教职工;学生;党委会、纪委会及党委部门;校长、校长办公会议及行政部门;学术组织;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及群众组织;学院;其他机构;经费、资产及其管理制度;校训、校旗、校徽、校歌、校庆日及学校网址;附则
华中师范大学	9章,81条	序言;总则;举办者与学校;学校基本制度;学校的组织机构(管理)

4. 章程体现了以学术为本位、保障学术自由的大学精神

从首批核准的六所大学章程来看,此项探索成效也是显著的。比如对学术性组织的建设,主要包括学院基层学术组织和学校其他各类专业学术组织。对此,六所大学章程都把“学术组织”(或教学科研机构、学院)单列一章或纳入学校“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之下,着重强调学术性组织的职责、人员组成办法等,体现出学校对学术组织建设的高度关照;在

学术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保障上，六校大学章程也一致把“教职工”单独作为一章，载明了教职工的权利、义务及享有的权益保障，同样显示了对大学最重要的学术群体——教师的关注与重视程度。以章程为载体，为大学精神在现代社会的重塑与呵护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与保障，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大学章程建设的应有之义。

（二）六校章程文本的不足之处探讨

1. 章程内容仍需进一步完善

首先，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教育应当是大学章程中不可或缺的规定事项。对此，《纲要》指出：“在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积极发展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支持民族院校加强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但从六校章程看，显然忽略了对这一能高度体现我国国情的重要事项的规定。广义上来说，这样的民族团结教育应当是一种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下的国民教育，旨在促进民族之间平等发展、共同繁荣。因此在章程中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

其次，重要事项的缺漏还表现在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上。从章程体现的各校管理体制看，通常党委是学校的领导核心，集体研究决定学校改革发展中的重大事项及教学、科研、服务、管理等工作中的重大事项，而校长或校长办公会议的职责则是在党委领导下全面负责学校教学、科研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二者通过联席会议或党政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由此，实际上二者职权范围存在多处重叠且缺乏细化的制度规定，尤其是教学和科研中哪些事项应从党政权力范围中划拨出去交给学校各类学术性委员会管理仍未厘清。这不利于祛除大学的行政化色彩，不利于呵护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学术自由精神的彰显，对此大学章程还必须配合规范的决策程序来保护大学组织这一特性。

此外，章程内容也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以一组数据说明：有学者通过对美国大学章程文本的研究发现，美国大学章程的篇幅普遍比我国长，详尽程度也更高。以耶鲁大学、密西根大学、康奈尔大学为例，三所大学章程平均页数为43页，平均条款94条，平均字数（英文）为17827字。而相比之下，我国这六所大学章程平均页数为16页，条款平均不超过90条，字数（中文）最多的也只有14000多字。从内容看还多半停留在框架性规定上，存在概念笼统、标准不清、量化标准不明的问题。

2. 章程可操作性需进一步增强

从目前公示的章程看，已有内容尤其是涉及管理和实践层面的具体问题还需进一步明晰，以增强章程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如以大学中最大利益相关方教职工和学生权利、义务的说明为例。从六校章程来看，此项规定还显得十分单薄，基本上不超过10条。但国外大学章程对此却有完备的师生权利、义务和奖惩条款，大部分都有几十页，这些奖惩制度、采取惩罚措施的依据等也都一一列出。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章程中对学生不当行为的定义分了4条，仅第1条就列举了15种情况：不诚实的评估；伪造学历、研究成果，向大学或大学职员虚报或故意误导信息；不听从监考人员的指示；故意阻碍或破坏任何大学的教学、学习、研究、试验或考试；故意阻碍或破坏大学正式会议、进程、仪式的活动；进行骚扰或歧视等。如此全面详细的规定对学生行为的监督无疑十分有效，也做到了让大学中一切相关主体的行为活动都有章可依。

通过对国外章程的研究发现，一般国外章程文本可分为三个部分：总纲性原则、执行性细则、特色规定，可操作性通常落实在后两个层面上。而对于我国大学章程来说，落实执行细则并挖掘学校特色恰恰是不够完善的地方，也是章程缺乏实际操作性的体现，这是今后建设大学章程中需要着重探讨并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我国大学章程文本建设的建议

首先，大学自身要切实提高对章程重要性的认识，认真对待、自觉充实、完善章程文本，

使其成为依法治校、依法治校的有力保证。目前我国章程建设很大程度上还是外力作用下推动的结果，大学自身普遍缺乏制定章程、照章办学的主动性、积极性和探索章程建设的热情与意识，导致大学章程的文本质量普遍偏低，实用性不高。因此，除了要不断完善我国法制环境，教育主管部门对大学章程大力推动之外，更要靠大学内部多方提高认识。一是校领导要成为学校章程建设的表率 and 领军人物，要树立信心，并勇于作为，不能把章程制定工作全部推给下属，应积极主动参与到章程制定工作中来。二是全校成员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大学章程的认识与学习，同时学校要对章程大力宣传，广泛征集基层人员意见，从而多方努力，共同促进形成大学相关利益群体知章、懂章、守章的良好局面。

其次，要以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为契机，推动大学章程建设。大学章程建设与现代大学制度二者应当是相互依存、共同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需要有完备有效的章程为其提供法制支持与法制保障；另一方面，章程建设也需要现代大学制度作为制度支撑并且构成现代大学制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新形势下，对于大学内部来说，要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与组织机构，探索并充实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的深刻内涵，合理划分并厘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与关系，保障学术自由，尤其要扩大并维护院系基层学术组织的学术权力，真正落实学校民主管理与监督的实现渠道。在大学外部关系上，要探索建立大学与政府的契约型合作关系和有利于实现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法制机制，保持大学自主与政府有限干预之间的平衡。同时，要逐步实现社会广泛参与对大学的评判与监督。

最后，还要认识到章程建设始终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经过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修正、完善的过程，对此我们必须抱之以认真严谨和持之以恒的心态。

（摘自：《对教育部首批核准的六所大学章程分析与建议》高校教育管理 2015 年第 1 期）

中国大学学术生态的历史反思与现代重建

（一）中国大学学术生态的历史嬗变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分水岭，中国大学学术体制的演变可分为两大时期，即1949年以前的民国时期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期。前一时期的大学体制以学术独立、政学分离为基本诉求，而后一时期的大学体制以计划学术、政学统一为基本特点。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达到世界前沿的学科数量已有不少，如清华之国学、数理，北大之文史，协和之医学都名扬海外；此外，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的工学、金陵大学的农学、南开大学的经济学、东吴大学的法学等，都初具国际知名度。自然也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一线学者。一提起民国教育，可能所有人都会想到那灿烂如星辰般的大师们，会想到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仿佛那个时代高洁得不食人间烟火，仿佛只要唤一声大师，大师们就驾着七彩祥云从天而降。可梳理历史就会发现，民国大学教育的成功以及民国人才的井喷并非真的如此简单。民国大学之所以有如此成就，与按照政学分离、教授治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等世界大学通则办大学有着极大的关系。民国初年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国内知识界普遍接受和宣扬西方自由、民主的启蒙思想。受此影响，一些知识分子在崇尚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的同时，又力图摆脱政治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干涉与束缚，开始自觉、主动地吁求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

1942年6月，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三次下命令给西南联大，要求教材内容、考试方式、课程设置都要全国统一，由教育部核准。西南联大教授们经过认真考虑、讨论，对教育部的办法提出异议，并向教育部呈文，内容大意如下：大学包罗万象，任务为百年树人。各大学自有其教学经验，宜稳定，不宜多变。同一课程，不同学校，讲授内容各不相同。教育

部行政领导时有更迭，如果一切都由教育部决定，朝令夕改，大学将无所适从。今天的教育部官员，也多当过大学教授。当他在当教授时，专教一门专业，兢兢业业，尚恐出错。为什么到了部里，忽然成了万能的指挥者，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全国大学，水平参差不齐。教育部的统一教材、统一课程的规定似可以允许例外。呈文发出后，未见教育部第四次来文，师生们松了一口气。

成立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强调学院自由乃学术进步之基础，“注重科学研究之自由精神”为其一贯宗旨。1940年3月，因院长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评议会计划依法选举3名院长候选人，呈请国民政府遴选。其间，蒋介石为奖赏未跟随汪精卫叛逃的汪系人物顾孟余，以“下条子”方式指示推举其为继任院长。对此，评议员们“却不愿以研究院为酬勋（没有跟汪去也）的奖品”，且“选举应凭各人自心，不宜有厉勉强”，纷纷予以抵制。最终，29名评议员本着学术独立与自由的原则，以记名投票法，推举翁文灏、朱家骅（各24票）、胡适（20票）为院长候选人，顾孟余仅1票。这一结果“无非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

何兆武先生在谈论大学新旧体制之差别时讲道：“新中国建立之后，体制跟旧社会不一样，现在的学校是党领导一切。旧清华是教授治校。它虽然也是国民党政府之下的，但国民党并不直接领导。比如我做学生的时候，校长梅贻琦也是国民党员——那时规定大学校长必须是国民党员——但我从没有听他讲过蒋委员长或者三民主义之类的话。再比如，张奚若先生教授政治思想史，指定的必读参考书里就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后来在历史所，还有年轻人问：‘你们那时候看得到《共产党宣言》吗？’我说我就读过。他问：‘不是不许读吗？’我说大街上是不许公开卖的，但在图书馆可以看得到。那时候学校有点像是独立王国，不受外界干扰。”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学术生态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50年代初全国院校调整至1976年“文革”结束。其特点是结束了民国时期学术相对独立的体制，建立了以党治学的政学合一体制。这一时期的中国大学，实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控制。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论文、史、哲、经、政、法，基本上是独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局面。学者们不但不允许有独立的学术立场，也基本失去了自由思想的空间。

第二个阶段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1989年。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被粉碎，平反冤假错案，知识界走出恐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以学术出现的政治命题，开始扫除人们走向新时期的思想障碍，学人开始挣脱对领袖的思想依附。8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虽时松时紧，但学术界总体上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与人类文明的主流接轨。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比如走向未来学派。

第三个阶段是1990年以后，学术生态以一种新的情势再度恶化。“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句流行于80年代初期，反映了当时市场经济大潮下知识分子惶惶不可终日之心境。这一时期，政治权力对学术的控制呈现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特点。为了改善知识分子的科研和生存状况，继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立后，199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也随之建立。随着经费资助力度的不断加大，跑项目、圈经费，即“跑部钱进”成为多数学者改善生活的捷径。政治权力对学术的干预，不再是由政治直接控制学术，而是政治通过经济的中介来“驯化”学术。近十几年，随着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大批学者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已然放弃学术的独立性。经济、政治利益已经完全绑架了学术。

（二）当今中国大学学术生态的特质及流弊

从组织形态上讲，当今中国大学是以“政学统一”的学术建制和“官本位”的管理体制为基本特质的，其突出特征有三：

一是行政权力本位，以官治学治校。由国家行政机构掌控学术资源，如学术机构的设立权、学术经费的分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的支配权、学术书刊的出版权、学科点和学位的设置权，无不由官方牢牢掌握。官方掌控的学术头衔包括院士、学部委员、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等。行政职务包括校长、院长、处长、系主任等。经费包括国家级和省部级基金项目，以及各级各类政府咨询项目。以科研项目为例，随着国家向科学和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多，名目繁多的各种项目也在迅猛增加，教授们每天为填写项目申报表而埋头苦干。表面上大家都在干活，但干的大都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事，大量的时间都耗在了项目申请以及项目的检查和验收上。有一些项目拨款量巨大，比如清史工程拨款6个亿，10年前承担其中一本书，就给40万。在丰厚的利益面前，一般学者无法拒绝。政府的课题又总是让学者跟着政府走，令教师无法独立开展研究。政府为大学构造的学术生态使得大学无法冷静和独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根本的指导思想还没有跳出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模式，行政权力主导一切、以官治学治校的大学体制日趋严重。不仅如此，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商业化的弊端也侵入到高校，贪婪的资本正在蚕食着对学术的热情与忠诚。在行政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大学的学术生态日益显示出诸多流弊。

二是同行评价弱化，数量考核泛滥。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从新中国建立至80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秤。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大体公正。对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可以破格提拔，使其脱颖而出。而行政主导下的科研管理体制的最突出特点就是量化管理，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未必得高分，大量生产的平庸之作照样拿高分。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谁的项目级别越高，谁的得分就越高。有学者不无调侃地说，农民种地要看收成，现在成了比谁播种多，甚至是播种计划的比赛，收成好坏反而没人问。数量导向有两个特征：一是多多益善。用多来代替好，不是科学的生产，而是实物生产，它完全违背了科学生产的规律。二是人们愿意做简单的事，愿意将一个完整的研究分散为若干个成果，也让科学出现了断裂。数量导向不仅仅是质量的反面，还是让人不能轻松的原因。科研人员将很多时间花在开会或者“跑”经费上。这些年中国科研投入确实多了，但是以行政力量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方式却让我们的科研人员为经费而科研，以争取到经费为最根本任务。急功近利的科研政策成了科研人的枷锁。这种学术环境，如何产生大师？据一位通过“百人计划”回国的研究员说，他花很多时间来应付开非学术会议、检查、评审和写课题申请书，只有在周末找点时间来做实验。科研人员能投入科研的时间太少，他们的很多时间花在开会、写或者“跑”课题经费上。在中国，如果哪位学者有爱因斯坦的成就，恐怕也得一生都要为争取课题经费而奔波。在这种环境下，老师们做的研究具有策略性，而不是纯粹的科学研究。

三是理想主义缺失，功利主义盛行。中国虽然全面地移植了西方科学和科研体制，但科学所内含的“理想主义”文化精神——为求知而求知的自由探索精神——并没有在中国生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功利主义盛行和理想主义缺失尤甚，浮躁的学术生态已然成为阻碍当今中国科学发展的最重要原因。数学家丘成桐教授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重名利是中国科学鲜有重大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不少中国科学家学而优则仕，甚至把自己的理想就定位于学术上有所成就后就做个官，即使是在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成功的标志也是升官发财，这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丘成桐教授所言，实乃切中我国学术界之时弊。中国缺少一批年轻力强、把科学研究作为真正的兴趣所在的科学家。功利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是我国在科学上无法有重大突破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目前科研人才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今的优秀学子大多避开基础学科而进入经济管理学院学习经济与金融。学生选课时总爱问：“这课有啥用？对面试和求职有帮助吗？”清华大学钱颖一教

授坦言，每年听取学生对课程设计的意见时，不绝于耳的是对找实习无用课程的抱怨，还有对找工作有用的课程为啥不多开一些、不早开一些的质疑。目前中国大学教育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浮躁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体现在学生身上，就是选择专业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而是根据自己出来能否当大官、赚大钱；教授的功利主义，就是奔着SCI和课题项目，忘了做学问才是他们一切的出发点。教授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驱动；学生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学习和研究的功利性太强，不仅限制着个人发展，也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创新与文明发展。

抗战期间，有人高呼：“华北之大，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惊呼：“中国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今天的中国大学，人们天天在对项目、资金、奖励、头衔和荣誉的追求中挣扎。多少人费尽心机拉关系、搞项目、出成果，多少人绞尽脑汁发文章、争荣誉、求奖励。大学学术研究，不再是老师快乐的、自由的、独立的创造性工作，而变成了强迫的、功利的、高量低质的快速生产。全社会都要反思：是什么把快乐的探索变成了痛苦的负担？是什么把自由的研究变成了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是什么把独立的思考变成了附会权势的制作？是什么把纯洁的“象牙塔”变成了污浊的“名利场”？

（三）重建大学的学术秩序和学术尊严

1. 跳出计划体制管理模式，按照大学的逻辑办大学

要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就要重视从运行体制改革开始着手。回顾“985工程”实施以来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无疑取得了重大成就。然而，也应该看到大学的改革与发展在许多方面是表层的、外延的，如巨额投资、大学合并、学科建设、教授分级等改革都未曾触及大学体制之根本。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确实存在着一些深层次问题：大学行政化、官僚化日趋严重；大学风格在趋同，大学多样性在消失；大学精神、大学传统在衰微。究其原因，根本的一点就是“行政的逻辑”愈来愈支配着大学的运行。现在，大学已然成为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缺少独立的身份、地位和权利，只能按照政府的行政指令来活动，不能按照大学自身的逻辑来运行。然而，一个没有奠定学术自由的价值观、教授不拥有学术权力的大学，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更遑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得到迅速发展，但办大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却还没有跳出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模式。中国大学问题的主要根源就在于此。中国的大学教育何去何从？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袁伟时认为，中国的大学应当改革，改革的前提是坚持现代大学制度，充分保障办学的自主权，保障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现在一般来讲，对自然科学的干预比较少，但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干预比较多，而决定国家命运的常常是后者。引领学术发展的往往是少数派。假如少数派和主流一样了，就没有创新。凡是创新的人一定是偏离主流、突破传统的，在大学里必须尊重这些人。哲学家詹姆斯在谈“真正的哈佛”时说，“最值得人们合理仰慕的大学是孤独的思想者最不会感到孤独、最能积极深入和能够产生最丰富思想的大学”，因为这里有“对例外和奇特的宽容”。这就需要行政力量减少对学术的干预。

大学在深化制度、体制和机制改革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按照“大学的逻辑”办大学，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按照“行政的逻辑”办大学的某些做法。近年来，人们对教育部“空投”校长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遴选校长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大学校长的选拔与任期到底由谁说了算？有人甚至感叹：“在政治上大学教授还不如农民，因为农民尚有权选举村委会主任，而教授却无权选举与自己切身利益攸关的校长。这实在是匪夷所思。”我们口口声声说，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教授们既拥有知识又是人才，为什么不尊重他们合理的权利呢？除了自由学术研究的权利以外，大学教授还应享有两大权利——选举校长和罢免校长。目前，我国不少重点大学都把目标对准“世界一流”，而选择一流的教育家任校长则系创办一流大学的关键之关键。既然国际著名大学已有遴选校长的成功经验，我们为什么不学习呢？不是

说要与国际接轨吗？为什么不与国际成功的办学理念与管理体制接轨呢？高等学校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方，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如果在大学都不能民主选举校长，那么中国的民主还要等到何时呢？因此，在我国大学实行民主选拔校长已刻不容缓，迟改不如早改。否则，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难以发挥，最终也必将制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大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不同于关系到许多群众利益的政权机构。在大学里，最先进的思想最初往往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因此，最适合大学的管理机制是学术权力基础上的校长负责制。落实高校自主办学权，就要尊重教授们推荐、选举校长的权利。有了它，我们才有希望建成若干一流大学。

2. 超越科研量化考核，加强学术同行评议

对教师学术工作的评价是高校教师管理的重要手段，是教师业绩考核、职称晋升和学术奖励的基本依据，在高校科研工作中具有指挥棒式的导向作用。因此，建立科学、公正的学术评价制度，意义特别重大。一般来说，学术评价的方法主要有量化评估和同行评议两种。所谓量化评估，就是对每个人的科研和教学情况进行数量化处理，折合为数字单位，并作为考察其绩效，决定其职称评定、岗位设置、学术奖励的依据。所谓同行评议，指的是根据本领域同行专家的评议意见来判断学术研究的质量。在我国的学术评价中，这两种方法都得到了采用。然而，量化的指标往往被视为一种更为精确、客观、透明、公平的标准，能够减少人为的主观评价，做到数字面前人人平等，而且便于操作和管理，因而尤为受到重视。

毋庸置疑，量化评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量化管理具有客观性、简单性、可比较性的优点。就学理层面而言，学术的质量与学术的数量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很多研究表明，研究的质量与数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具体来说，做出杰出成就的学者中有相当的比例也是高产的学者，但反过来不成立，即高产的学者并不一定是优秀的学者。“高产的学者并不一定是优秀的学者”，这恰恰是中国目前学术界的症结所在。在量化管理政策的激励下，我国产生了一大批高产的学者，但真正大师级的学者却少之又少，尤其是缺乏有世界影响力的学者。学术生产的数量繁荣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显著现象，其背后的问题是缺乏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期刊评审制度。

随着高等教育事业规模的扩大、大学规模的扩大以及高等教育内部差异的扩大，主管部门当然有理由制定更密集的质量保障系统和学术评价系统，以保证教学与科研的效率，这些也符合科层制的“可预计性”原则。但是，这种理性化和技术化的质量保障思维能否促进学术创新，是大可质疑的。要促进真正的学术创新，必须小心呵护来自学术的自发秩序。《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2010）指出要“改革学科建设绩效评估方式，完善以质量和创新为导向的学术评价机制”，这应当是中国高校共同努力的方向。那么，应当如何落实“以质量和创新为导向的学术评价机制”？高等教育是一个由国家系统、院校、学科共同体等不同层次组成的体系，需要在不同的层面同时着力，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首先，就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层面而言，政府要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在学科评估和大学评估当中弱化数量导向。其次，具体到院校和院系的层面，在职称晋升和考评当中，应当更加注重同行评议的意见，而不是采取简单的量化考核。应大力推进目前一些高校已经开展探索的“学术代表作”评价制度，进一步摈弃“重数量、轻质量”的观念。最后，在学术制度和学术共同体的层面上，应当在更多的期刊推行同行评议制度，从学术发表的层面引导学者发表高质量论文。上述环节中，教育主管部门须弱化量化评估是最为关键的一环。一直以来，由于教育的特殊性和长期性，如何考核教育质量都是一个普遍难题。政府在教育质量和研究绩效方面提出指标要求，并通过评估与排名来推动教育界的竞争和发展，初衷是好的。然而，这也导致了各大学过于看重学科排名。那些无助于提升大学排名，但对整个院校和专业建设都有好处的做法，有时就会被视为徒劳无益，最终促使大学进行“统计数据竞赛”。

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必须从以往量化评估的管理模式中跳出来，寻找激发师生内在斗志和责任感的关键点。

3.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学术生态系统

近些年来，我们陷于复杂的文化怀旧与乡愁中，追寻逝去的传统，仰慕过去的大师，感叹彼时清醇学风，歆慕以往学人的成长境遇。书市上满是关于民国学人的生平事迹，彼时的大学、学术研究机构和学人杂志都成为传奇故事的对象。一方面，现实中的学术乱象，不断挫败着我们的期望与想象；另一方面，过去的学人风骨、澄明之境，容纳着我们对一个学术乌托邦的想象。但是，过度的想象与失望是不适宜的。已断裂的，就得弥补；已倾塌的，就得重建；尚没有的，就得创造。

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学术创新需要平衡的学术生态系统提供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即公平、公正的学术竞争环境，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价值理念，以及鼓励科学创新、积极探索真理的学术研究氛围。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职能在于保障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保持学术生态系统平衡，确保创新生命力常青。现代大学制度是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治理大学的制度体系。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现代西方大学，其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等大学核心理念在大学发展过程中基本没有中断过，并且深入人心，成为大学的烙印。建立在大学核心理念基础之上的西方大学制度经过长期建设和完善，已经成熟并且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为平衡和健康的学术生态系统提供了制度保障。反观国内，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大学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由此反映出我国大学目前的真实办学理念和办学价值观与现代大学有很大差距，管理体制和制度体系不能使大学学术生态系统形成良性循环，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大学学术创新和培养创新型人才提出的新要求。中国的“千人计划”曾在世界各国引起极大震动，如果中国今后能继续坚持吸引海外专家的政策，并且像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一样，将吸引国外专家的范围扩大到背景各异的各种族人才，这将会成为推动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提供和维护一个推崇新想法、允许挑战学术权威的学术环境，是吸引世界顶尖人才的必要条件。

学术生态系统失衡，究其根源，与我国大学实际的办学理念和大学制度存在的问题有很大关系。从大学外部来看，虽然经过改革与发展，大学与政府之间的权力界限日益明晰，但政府依然牢牢控制着高校发展乃至高校命脉的资源配置权。如若政府人员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资金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行政权力实质上在不断膨胀和扩大，那么大学难以真正建立起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内在生命机制。从大学内部来说，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滞后则严重阻碍了我国大学的发展。例如，大学学术委员会中的领导职位多由“双肩挑”的教授担任，造成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交叉混合。而目前我国大学中行政权力相对于学术权力往往占据强势地位，致使普通教师在学术权力行使方面得不到有效保障，教师的治学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阻碍了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环境的建设。在我国高等教育目前的发展阶段，针对大学存在的问题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有重要意义。

通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可以逐步解决教育行政化这一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引导大学按照自身的学术组织性质去发展和创新。这也是政府、社会和大学的共识。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其重点应该是通过制定大学章程，明确界定大学利益各方的权力边界，确立大学自身办学以及学术研究人员的主体地位。同时，建立权力实施监督制度，尤其要关注和重视制定落实大学章程的制度细则。如此一来，制度在制定后才不至于被束之高阁，从而保障学术生态系统具有自治的能力和保持对胁迫的恢复力，形成平衡的学术生态系统，促进学术创新和学术发展。

（摘自：《中国大学学术生态的历史反思与现代重建》复旦教育论坛 2014 年第 12 卷第 6 期）